臺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
2008 年 12 月，頁 287-293

BIBLID1012-8514(2008)42p.287-293
2008.3.26 收稿，2008.12.10 通過刊登

§書評§

山室信一，《キメラ——満洲国の肖像》增補版

東京：中央公論，2004，中公新書 1138，428 頁。

陳　榮　聲*

如果從太陽來看，地球的黑點將是滿洲國。
——石射豬太郎，《外交官的一生》

山室信一（1951-）現為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，研究領域為近代日本政治史、法政思想史。除了本書外，還著有《法制官僚的時代——國家的設計與知識的歷程》（獲 1984 年每日出版文化獎）、《作為思想課題的亞洲——基軸・連鎖・投企》（獲 2001 年亞洲太平洋獎特別獎）、《日俄戰爭的世紀——從連鎖視點所見的日本與世界》等書。[1]

《キメラ——満洲国の肖像》（《幻獸——滿洲國的肖像》）一書於 1993 年出版，當年獲得《朝日新聞》頒發的吉野作造獎，本文擬評論的是 2004 年的增補版。增補版在原版之外增加約占四分之一篇幅的「補章」，其中有部分是山室這些年來對滿洲國的新見解。由於是增補版，本書嚴格說來不能算是最新的學術著作，但私意以為，本書可說是近年來日本學界對滿洲國的研究中頗具代表性的著作。[2]

*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

1 山室信一，《法制官僚の時代——国家の設計と知の歴程》（東京：木鐸社，1984）；《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——基軸・連鎖・投企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2001）；《日露戰爭の世紀——連鎖視点から見る日本と世界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2005）。

2 本書已有英譯版：Shinichi Yamamuro, Joshua A. Fogel trans., *Manchuria under Japanese Dominion: Encounters with Asia* (Philadelphia: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, 2006).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《幻獸——滿洲國的肖像》是一本關於滿洲國的概論。它是日本所謂的「新書」，屬於普及知識的書籍類，其所設定的讀者是稍具知識的一般民眾。由於新書不是純學術著作，山室需要回答與他同樣出生於戰後、沒有親身體驗滿洲國的讀者可能提出的疑問：我們為什麼必須知道滿洲國呢？山室在增補版的後記中，藉日本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的話，回答了這個問題：「日本這國家並未舉辦滿州國的葬禮。好像偷吃東西後，卻又抹乾嘴巴般地裝作不知道。這樣對歷史與理性來說，是一種背信行為」;「滿州國究竟為何？日本人總有一天必須回答這個問題」。（頁 387）[3]基於對歷史知識認真探究的信念，山室想要回答「對日本人而言，滿洲國是什麼」的問題。

讀者初看本書，應該會對書名印象深刻。翻查一般的英文字典，可知幻獸（キメラ, Chimera）的原意為「一種古典神話中的怪獸，通常以獅頭、羊身與蛇尾的樣貌呈現」，衍生義為一種「妄想、幻想」。[4]山室以此來比擬滿洲國，獅頭是關東軍，羊身是天皇制國家，蛇尾則是中國皇帝。這個比擬相當有意思，誰是這個國家的主角，一目了然。他不諱言，這是仿效德國紐曼（Franz L. Neumann, 1900-1954），以《舊約・約伯記》中的邪獸（Behemoth）形容納粹的方式，來形容滿洲國。他認為滿洲國就如同幻獸般，是一種拼湊出來的怪物（頁 16）。我想說明的是：幻想之物不必然為偽，也不必然為惡，即使最後證明是一種妄想，也應該試圖去理解其夢幻之處何在，否則將難以理解此等幻獸何以會現身於人間。但我們也要小心，不要為其魅惑，而忘卻其幻滅後那個真切的闇

3 「滿洲」一詞在清末之前主要是部族名稱，清末時逐漸成為地區名稱，可與東三省互用。由於 1930 年代後日本佔領中國東北，「滿洲」一詞遂帶有日本侵略中國的特殊含意。本文儘量使用當時歷史用詞，滿洲一詞不特別使用引號。另外，滿洲、滿州常為人混淆，但考量到中國王朝正統性的問題，自許為水德的清朝稱其部族為滿洲，滿洲一詞應為較正確之稱呼。見山室信一，《キメラ——満洲国の肖像》增補版，頁 320-321。引文竹內好的話做「滿州」，本文並不做更動。

4 Random House ed., *Random House Webster's College Dictionary* (New York: Random House, 2000), p. 231.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黑世界。

以下略述本書各章節內容。第一章〈日本唯一之活路〉，以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的思想為中心，說明九一八事變的成因。首先，對石原等人來說，面對 1920 年代中國的國家統合與國權收回運動，日本所謂「滿蒙特殊權益」，有空洞化之危機。其次，面對日本國內的種種問題，石原希望先外後內，藉由外部的事變以改造日本。最後，在石原獨特的戰爭哲學觀——世界最終戰論下：他認為未來歷史的發展將是代表東西文明對抗之日美最終決戰。在日美最終決戰之前，日本必須確立自給自足圈，取得對蘇聯的戰略據點，並鞏固朝鮮統治。因此，領有滿蒙成為解決上述一切危機的最佳方案，如同亞歷山大一刀揮斷難解之繩結般，石原也想以最直接的方式，解開滿洲這個難解之繩。

第二章〈建造滿蒙各民族之樂土〉，則說明從九一八事變到滿洲國成立的經緯。對關東軍而言，由於國內外的反對，加上自身後勤、行政、財政資源不足等考量，關東軍不得不放棄直接領有的形式，改以製造既成事實——「獨立國家」的方式，強迫國內外接受。同樣的模式也套用在日後日本在華北、華中進行之「分離工作」。九一八後，有復辟、保境安民打算的中國東北要人，與抱持興亞主義、民族協和理念、確保生存權益的在滿日人，以及期望改革日本的日本知識分子，基於各自的考量，對滿洲國的成立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。然而他們的企望，與關東軍將滿洲國視為對蘇戰略據點的現實目的有很大落差，這樣的落差為之後滿洲國內部的摩擦、衝突埋下了伏筆。

第三章〈欲為世界政治之模範〉，說明滿洲國初始的政治規劃與實況。為了維護日本在滿的既得利益，確保過去簽訂條約的有效性，並避免非議，關東軍操縱下的滿洲國，一方面強調與中華民國的異質性與斷裂性，一方面又接受其法治制度與法政思想。關東軍表面上高唱王道主義，在實踐上卻是十足的霸道：他們選擇有聲望、抱持復辟美夢，卻無政治實力的溥儀，使其擔任執政，與日本簽訂「日滿協議書」，使關東軍可以獲得滿洲國政府委任的名目，任意插手滿洲國人事與軍事。山室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

認為，關東軍操縱滿洲國政治的四個關鍵概念是：總務廳中心主義、日滿定位、日滿比例與內面指導。也就是表面上獨立的滿洲國，在實際運作上，由於關鍵部會、職務由日人官僚把持，而日人官僚又為關東軍節制，使得滿洲國被牢牢地掌握於關東軍手中，成為關東軍的基地國家。

第四章〈經邦之長策為常與日本帝國協心同力〉，則說明滿洲國中、後期的政治運作實況。日本自 1933 年退出國聯，放棄國際協調路線後，對滿洲國的支配便更加露骨。1934 年溥儀之所以即帝位，對關東軍而言，與其說是助其實現復興清朝的夢想，不如說此舉可以使滿洲國在體制上更接近天皇制的日本。滿洲國成為戰時、戰後日本的實驗室與人才研習所；滿洲國的統制經濟、國土計畫、一國一黨等規劃，為戰時或戰後日本所承繼；東條英機、岸信介與松岡洋右等有滿洲經驗的人士，在戰時或戰後的日本也相當活躍。另外，滿洲國供給的煤、鐵與食糧，也成為日本發動戰爭的重要資源。滿洲國與日本是一種惡性循環的關係，「日滿一致化」的結果是使彼此走向敗亡。山室認為，滿洲國是否如當時宣傳的那樣，是「日本唯一之活路」，大有疑問，但滿洲國使近代日本走向滅亡之道，確是毫無疑問的。

終章〈幻獸——其實相與幻像〉，對滿洲國的歷史進行總結。滿洲國民族協和、王道國家的高遠理想，經由自我民族中心主義的日本人實踐之結果，成為可怕的「沒有國民的兵營國家」。滿洲國殘酷的現實，無法用「善意的惡政」這樣的話語輕鬆交代過去。滿洲國一方面展現了近代日本的問題癥結，如軍隊、天皇制、官僚制等問題，另一方面也展現了二十世紀的問題癥結，如戰爭、革命、壓迫與解放等問題。不只是日本的研究者，其他國家的研究者在討論滿洲國時，都必須正視這些問題。

補章〈滿洲與滿洲國的歷史意義究竟為何〉，藉由一問一答的二十四個問題，簡要地彌補本文偏重滿洲國的法律與政治層面的缺憾。這些問題包括「滿洲」、「滿州」的名稱問題；滿洲的地理概念；滿洲國建立前，滿洲與日本的關連性；各種人群，如一般日本人、日本女性、中

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

國人、朝鮮人、白俄、波蘭人、穆斯林與猶太人等，在滿洲的活動，以及他們對滿洲的認識。對不同的人來說，滿洲也許是充滿異國情趣的新天地，也許是「明治天皇御懿德」的聖地，也許是一個「疑似亡命空間」，也許是屈辱卻又令人懷念的故鄉。總之，山室提示了關於滿洲與滿洲國需要更多視角、更全面實證研究的方向。

在臺灣及中國大陸，無論學界或民間，「滿洲國是日本關東軍掌控之傀儡國家」的歷史認識，已經是一種常識。但在日本，對滿洲國的認識則有所分歧。學界基本上也認為滿洲國是傀儡國家，但在日本國內有部分人，特別是曾參與滿洲國事務的人士，認為滿洲國具有理想國家的特色，其民族協和、王道樂土的理念並不虛假，並強調其對戰後日本及中國東北近現代化之正面貢獻。即使結果是遺憾的，但仍不能抹煞其善意之動機。上述的說法，我們姑且稱之為滿洲國「善意的惡政說」，這種乍聽之下似乎言之成理的說法，在日本始終存在。滿洲國究竟是傀儡國家還是理想國家？在臺灣或中國大陸，也許無須深究；但在日本，這是進行滿洲國研究時的首要問題。

《幻獸——滿洲國的肖像》基本上處理的就是滿洲國的歷史定位問題，山室從滿洲國實際的運作狀況指出其作為傀儡國家之本質。不過我認為本書的價值並不止於此，更在於以一種持平但又不失立場的態度來理解滿洲國。關於滿洲國的評價，分寸拿捏相當重要，若僅是討論滿洲國的傀儡國家性質，容易使人有舊調重彈之感；但若過度為滿洲國翻案，又有如美國學者杜贊奇（Prasenjit Duara）的論著，[5]淪為「觀念的遊戲」的危險。山室儘可能去理解「善意的惡政說」的背景，提出滿洲國得以成立，並非僅靠關東軍的冷酷計算而已，抱持著興亞主義、民族協和理

5 Prasenjit Duara, *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: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* (Lanham: Rowman and Littlefield, 2003). 關於杜贊奇過於重視滿洲國的理念性之問題，陳永發、沙培德（Peter Zarrow）曾分別撰寫該書的書評，參見陳永發，〈關於滿洲國之建構〉（評文一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44 期（2004，臺北），頁 177-184；沙培德，〈關於滿洲國之建構〉（評文二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44 期，頁 185-194。

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

念的在滿日人之理想性，也不能忽視，這提醒我們不能過分簡單地理解當時日本人對滿洲國的態度。但這絕不意味著山室認同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「主觀的善意」，他指出，即使「無私、無償的主觀善意並不保證結果必然為善」。（頁 14）在滿洲國所發生的殘酷現實，正證明了「主觀的善意」的災難性。

從《幻獸——滿洲國的肖像》增補版一書中，還可以看到日本學界近年來有關滿洲國研究的趨向。如上所述，滿洲國對戰後日本而言，一直有歷史定位的問題。無論是理想國家或是傀儡國家的說法，基本上都是從日本人的角度去問：日本這個國家對滿洲國做了什麼？滿洲國又對日本產生了怎樣的影響？日本學者對滿洲國的關懷，偏重於日本官僚、軍隊、企業扮演的角色，以及滿洲國與近代日本的互動關係，因此關於滿洲國的研究著重於經濟與政治層面的探討。山室《幻獸——滿洲國的肖像》的本文，基本上也是這樣的觀點，主要從法律與政治的角度來理解滿洲國。

既然滿洲國的本質是傀儡國家，這樣的角度相當程度上確實可以有效理解滿洲國。不過若過於偏重滿洲國與日本國家的關係，很多面向容易被忽視，究竟滿洲國是在怎樣的地域上存在的？其中，怎樣的人過著怎樣的生活？過去日本的研究者對此並沒有深入的討論。而現在日本的研究者，如塚瀨進，提出新的研究方向，注重滿洲國與其所處中國東北地域社會的互動關係，也就是滿洲國的肖像不只是從日本近代史或中國近代史所看到的，更是從中國東北所看到的滿洲國，特別是一般人民所看到的滿洲國。[6]從《幻獸——滿洲國的肖像》增補版的補章中，也能發現這樣的趨向。雖然限於篇幅，山室只是點到為止，但他已提到過去常被忽略的空間認識、性別、人群互動等議題。

這樣的研究取向很值得我們留意。現在日本學界對滿洲、滿洲國的

6 樋口秀實，〈「滿洲國史」的爭論點——同時代與後世的觀點〉，收入劉傑等編，《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——來自日本學者及海外中國學者的視角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133-134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研究，重視從中國東北地域史的視點出發，我認為與研究課題本身的性質有關。歷史研究處理的是複雜的人事，沒有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研究方法，端看研究對象的特質而選擇較合宜的研究方法，所謂「史無定法」，此之謂也。二十世紀上半的中國東北，由於歷史的機緣，多種政治勢力與人群在此活動。此時中國東北雖已成為以漢人為主的地域，但蒙古人、滿人的影響力尚在，並且此地區與蘇俄、朝鮮、日本的關係亦相當密切，絕對無法忽視。僅從國別史的視角來理解二十世紀中國東北的歷史，容易過於強調政治上的歸屬問題與道德上的判斷問題，始終有不完備之處；從地域史的角度出發，也許可以彌補這樣的缺憾。在此同時，其他視角，如國別史，也不應該被拋棄，或許可以透過重層的理解，對區域歷史進行區域史、國別史、多重國家關係史、世界史等互補而非互斥的理解，以增進我們對歷史的認識。

山室信一以相當真摯的態度來撰寫本書。在後記中，他向讀者一一交代自己投入滿洲國研究的緣由、寫作本書時的心情起伏，並熱切地期望讀者提出批評與指教。他也承認在寫作時，由於對被捲入滿洲國的人們之命運深懷感傷，也許在行文中不自覺地投入個人情感，影響本書的客觀性。當然，現在的史學研究者，很少有人會相信歷史著作有絕對的客觀性，但相對的客觀確實是存在的，且很大程度取決於研究者自身的態度。從本書增補版的出版，我們可以看到山室對知識探究負責的態度，不因對滿洲國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而感到滿意，因此才會在出版十餘年後有增補版的出現。

（責任編輯：陳慧先　校對：李丞家）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